

益严重，于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一股以煤炭开采、金属采掘和冶炼业为中心内容的矿业救国的热潮。徐润就是致力于中国近代矿业，挽救危机，争回利权的杰出代表。

徐润在买办时期便亲自感受到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施加于中国的侵略伎俩，也亲身感受到在替洋人经营经济活动中，民族的经济利益被掠夺，其骨子中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其在后来的民族航运业、保险业、矿业和经济外交中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以挽救危机，争回利权作为出发；通过创办航运业、保险业、矿业；通过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签订《齐价合同》，成功地收回国家的利权，争回了民族利益。这就是半殖民地实业家徐润宝贵的民族精神。

第二节 徐润创办民族工商业的意义与作用

徐润投资与经营的民族事业始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业、地产；中经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轮船业、矿业；到 20 世纪初，他创办的民族工业进入成熟期。纵观徐润一生之事业，唯地产业贯穿其一生。然而，在黑夜难眠的旧中国，作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立面的徐润民族资本创办或投资的商业、地产、轮船、矿业、工业及教育、文化等，无疑具有民族性。

一、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具有明显的民族性

徐润创办的民族工商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时的世界已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度，西方国家对东方不仅进行商品输入，而且也加速进行资本输出，世界经济市场联成一体。因此，徐润经营的茶业、房地产业、民营企业不仅要与国内工商企业竞争，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经济市场的一部分，参与国际经济市场的竞争，争取民族市场和民族利润，所以，徐润创办的民族工商业及其经济运作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一）徐润经营茶业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

徐润经营茶业等商业活动近十年，在茶业等方面已获得了相当成功，大获其利，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他经营的宝源祥茶栈得到上海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二百万两银以上。徐润经营的茶业等商业业务规模扩大，势必与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经营的商业发生矛盾。早在 166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搜集茶种到英国试种，两个世纪过去，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方法也有创新，加之不用纳税，英国茶叶已经与中国形成激烈竞争。

一六六七年，英国东方印度公司首次命令该公司驻 Bantam 办事处尽力搜集最好茶种一百磅到英国试种。这一百磅过了两个世纪已经发展为七千五百万磅了。……但是英国的努力经营，在同一期间于阿萨密 (Assam) 开辟了茶园；一八六七至六九年间，印度已经能够运出七八百万到一千万磅的茶叶到伦敦市场去了。不到二十年后，锡兰也开始在茶叶的出产上以有力竞争者的姿态出现^①。

英国在印度、锡兰茶叶数量大增，“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叶输出国”^②的地位受到了动摇，到 1894 年英国在印度、锡兰的茶叶数量超过中国 13 200 万磅。“一八九四年英国由印度及锡兰输入的茶已超从中国输入的茶约一万三千二百万磅。”^③ 特别是“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不但不用纳税，而且是用科学的方法耕种的。”^④ 所以在经营茶业方面，英国宝顺洋行、怡和洋行就是宝源祥茶业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源祥作为民族茶业的典型代表，它必须通过自己竞争，抢占商业市场，赚取商业利润，而这些利润一旦成为民族资本，在今后的民族工商业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徐润的民族茶业在竞争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商业品牌，“天馨”茶、“怡兰”茶、“福葆”茶等民族商业品牌的形成，是民族商业文化和民族茶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近代茶王”徐润在竞争中争夺民族商业市场、积累民族资本和在竞争中创造自己的民族商业品牌是其早期商业中民族性的很好体现。

（二）徐润经营房地产业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

徐润房地产业的崛起、衰落、复兴正是一个房地产商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他首先要与西方地产商在房地产业中角逐、竞争、拼搏，也要与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抗争。“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⑤ 上海地价的日益翔贵吸引西方地产商投资于中国房地产业，西方地产商有帝国主义国家作保护，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战争不断。西方地产商以相对稳定的“国中国”租界为依托，大力发展租界房地产业。1844 年，宝顺洋行的创办人大鸦

① 于德利撰、张雁深译：《中国进步的标志》，前揭《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455 页。

② 前揭《中国进步的标志》，载《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455 页。

③ 前揭《中国进步的标志》，载《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455 页。

④ 前揭《中国进步的标志》，载《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455 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34—35 页。

片贩子颠地最初在上海黄浦江边购买 13 亩多的一片土地，时价每亩为 50 至 80 千文，但经过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影响，大批官僚、地主、富豪乃至一般居民纷纷涌向租界，租界规模日益扩大。“咸丰十年后‘发匪’反乱于邻邑，上海市情颇异，其时有洋房 269 间。”^①至 1910 年，仅英美公共租界就达 33 503 亩，合九英里见方；公共租界的外国房屋也逐年增加，1890 年 732 间，1900 年 1 011 间，1905 年 2 472 间^②；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人也逐年增加，“1843 年，上海初开贸易，统中国内地仅有洋人 462 名，”“1844 年，中国洋商增至 700 名，”“1850 年，在中国之总数 1 007 人，”“1860 年，在租界者洋人共约 1 400 名。”^③洋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等沿海城市或省份，“1846 年，洋商在上海者 108 人，”1850 年“上海 153 人，广东 298 人。”^④租界地价也日益疯涨，1865 年公共租界地价达每亩 1 318 两，1890 年上涨到 3 871 两，房产租金可获 30% ~ 40% 的厚利。

徐润经营房地产业异常艰难，他要与西方地产商以相对稳定的租界为依托而大力发展租界房地产业进行竞争；又要与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进行抗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战争是以保护宗主国商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作为民族房地产业的代表，徐润经营的房地产业却要在不平等竞争中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中法在越南、台湾、马尾等地开仗，法国兵轮驶抵吴淞，市面银根吃紧，商号、钱庄相继破产，金融危机袭卷上海。徐润借款的二十二家钱庄纷纷上门逼债，徐润不得已忍痛把自己多年经营的房产如青云里、靖远街、元芳路、杏花楼等处贱价卖出，以清还欠债，地产业也被迫把未建之地 2 921 余亩地以 107 余万两卖出，按以后估价，实值 991 万余两；按后来涨价计一千五六百万的地产业因 1883 年的中法之争而毁于一旦。当徐润在天津等北方房地产业有所发展的时候，又受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损失也惨重。“联军入京，和议定后，各国设立租界，几乎如塘沽庄之被占，强有弱无，不能理论。”^⑤这次变故，徐润认为损失上百万，“少赚百余万亦殊可惜耳。”^⑥

徐润经营房地产业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竞争性方面表现出的民族进取性和坚韧性。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力的徐润的民族性显著表现在敢于拼搏，跌倒了爬起来再奋斗。所以自 1883 年中法战争其

① 前揭《上海杂记》，第 13 页。

② 前揭《上海杂记》，第 13 页。

③ 前揭《上海杂记》，第 12 - 13 页。

④ 前揭《上海杂记》，第 13 页。

⑤ 前揭《洋务运动》，第 8 册，第 188 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49 页。

房地产惨败后，靠出卖家业筹资的徐润又在七年后的 1890 年在北方房地产业中神奇般地崛起，在塘沽车站、天津、滦州滦河高坡、北戴河等地购置地产一千八九百亩。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损失上百万，但却仍靠炒卖出手部分地产获利二三十万两，建成的房产每年收租也有近二千两。甚至到 1901 年徐润在北方尚有 1 290 余亩地产，而且当时天津马路已四通八达，经济非常繁荣，徐润在北方的房地产业前景颇为可观。1906 年徐润自营商业和房地产业又出现新的生机，成立肇德公司，地产“一百九十亩。已造房子约一百三四十间，每月收租五百余元。尚有未造之地约五六十亩云。”^① 这就是一个民族房地产业商人的抗争性和百折不挠的韧性与毅力。

二、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是生产力进步的典范

徐润一生创办的民营工业企业很多。1882 年创办同文书局，1902 年接办的景纶袜衫厂，此外，还投资上海虹口伦章造纸公司，粤东自来水公司，香港利远糖榨公司（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烟台缫丝局，华兴、华安保险公司，玻璃公司，电车公司，牛奶公司。徐润在这些民营企业中，向国外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提高了近代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徐润在同文书局向英国商人学习，采用先进的影印工艺印刷图书技术，他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这样记载西方的影印技术：“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②。这说明徐润对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非常羡慕，并决心仿效与学习。先进设备也是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徐润 1882 年创办同文书局时，就向国外购买机器，印刷古籍。“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③ 1885 年徐润在广百宋斋印书局也采用以钢版、铅版选辑的先进技术印刷中国文献典籍。1908 年，徐润独办景纶袜衫厂时，也毫不犹豫地添置一批先进机器设备以赶货期。“往返三阅月，定货五百余打，皆双线桂椒地等上品货，惜此种机器不多，出品亦少，一时不及赶办。且机器织布各有不同，针分巨细，线有精粗，货料全靠外洋运来，成做之衣又全在女工，女工或来或不来，实无一定期限，此中为难情形，非当局不悉。唯定货紧要，余复添购上货机器数部，以期赶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117 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31 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31 页。

速起货。”^①在当时中国社会习惯于手工技术而大多拒用机器设备的情况下，而徐润率先在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中注重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是先进生产力在近代民营企业中的集中体现。

三、冲破社会环境的阻挠完成创新是进步性的又一体现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社会环境对企业家有阻挠的作用，徐润当时创办民营企业的社会环境有两大阻挠作用：

一是封建势力的阻挠，徐润作为房地产业商人的民族抗争性还表现在要与盛宣怀等带有封建性质的势力作斗争。盛宣怀的后台是晚清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盛宣怀以李鸿章和官僚资本为后盾，在房地产业方面极力打压徐润。1883年，徐润遭受中法战争打击，面临22家钱庄一齐向他催讨债款这一最困难而且最窘迫的时期，请求盛宣怀带头为他的房地产公司认股一半。然而“诨谢绥之云盛亦一空心大老，无力于此，似可不谈。”而暗地则趁机落井下石，借徐润挪用局款，采用强硬手段低价将乍浦路、十六铺房产抵入招商局。盛宣怀害怕徐润、唐廷枢以后在十六铺开辟轮船码头与他争衡，故采取强力手段攫取之；而乍浦路则低价占为己有，而又要沽名钓誉：“此地未赎于雨记面上不雅，我为赎之，免得（雨之）多挂一笔账。”^②

二是未开发的社会风气的阻挠。徐润接办景纶袜衫厂购买机器进行生产，各地工厂大多风气未开，拒绝使用机器生产，如纺织业就是“丝业者不愿仿效”而“拒绝用机器。”^③1883年，徐润面对金融危机，请求各商家给予支持共度难关时，没有一家给予支持，徐润忍痛贱卖房地。“于是转商各庄，各庄但顾目前，亦无远谋，议定以两年为限，售现分摊，不能不以贱价脱手，以三百数十万成本之产业，只摊作二百余万之款清偿完结，受亏至八九十万，岂不痛哉！”^④

然而，徐润进步之处在于“存在征服的意志”，面对阻挠自己事业的社会环境有“战斗的冲动”，有冲破社会环境的勇气。他的房地产在一败涂地后又在北方崛起，他的民营企业在三次被骗后又终于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不仅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且还创立了近代工业品牌，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为民族工业作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04-105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9页。

③ 前揭《中国进步的标记》，载《洋务运动》，第8册，第456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6页。

贡献。

总之，徐润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至 20 世纪致力自营工业生产，半个多世纪劳累奔波，在近代民族商业、矿业、工业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进行抗争，为近代民族商业、矿业、工业的发展和争取应有的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徐润作为近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本能地表现出民族资本家的民族抗争性和民族反抗性。

第三节 买办、绅、商一体的徐润

徐润早期在宝顺洋行凭借伯父徐钰亭和叔父徐荣村的买办家庭背景和自己的灵活与随机应变，成为宝顺洋行的青年副总买办；也就是在买办期间徐润开始了他早期的商业活动，经营茶业、房地产、钱庄，1868 年后成为独立商人，到 1883 年成为“富甲沪上”大富豪；徐润又用买办期间经营和办实业赚来的钱捐官，1880 年捐得二品官衔，成为一个高品士绅。这就是集买办、绅、商于一体的徐润，这三种身份具有矛盾冲突的双重人格。作为买办，依附于洋行老板，表现为雇佣关系下地位的卑微，在人格上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然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上一方面表现愤慨，另一方面表现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并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这种心理驱使的结果是为外国洋行拼命扩展在华业务，具有明显的奴役性。作为绅士，一方面独立或合股投资于中国近代商业和近代工业，是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于一身的近代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又用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捐纳官衔，成为晚清的二品大员。作为商人，一方面重利、争利、赢利；另一方面又利用公务之便谋私利，甚至挪用企业公款从事自己的商业业务，表现出商人的唯利性。徐润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两种人格中生存与发展。

一、双重心态的青年买办

19 世纪的中国买办实际上地位非常低下，主奴性质的雇佣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中贵贱和尊卑观点深刻影响下的晚清买办对洋行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然而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上一方面是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就是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并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这种心理驱使的结果是为外国洋行拼命扩展在华业务，具有明显的奴役性。